

巫觋——探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

宋兆麟

说起巫觋、萨满，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其详了。其实，他们也有过辉煌，也有产生、发展、没落的历史过程，而且他们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觋的问题，给其以历史的正确评论。

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因以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长、部落首领，后来才有巫师。我国古代称“巫觋”，女性为“巫”，男性为“觋”。《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所谓“事无形”，即指看不见的鬼神，但请神必须歌舞，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是巫教的执行者，又是通晓歌舞的人。

对巫觋问题，我过去也没有当回事。后来的民族调查实践改变了我的看法。

1961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吴晗等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翦先生还写了一本《内蒙访古》，颇有影响。他们还提出一条建议，希望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起来，以备将来研究和展览之用。这些意见引起了在京学术界共鸣。当时主管文化、文物的领导很快接受了专家们的建议，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完成这一使命。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领导知道我参加过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就派我去进行民族文物收集工作，调查民族历史情况。

我起初是前往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调查，收集一千多件狩猎文化实物。其中对该族的萨满进行了详实调查，萨满教在北方诸民族中普遍存在。事后转赴云南，对西双版纳傣族、丽江纳西族、泸沽湖摩梭人、凉山彝族进行了全面调查，征集数以万计民族文物。其中对当地民族的巫觋进行了调查。巫觋是分类型的，亚洲南部、非洲为巫，亚洲和亚洲北部为萨满，我国是两种巫觋的交叉地带。我的调查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后又进行补充调查，地域范围也扩大了，远及海南、西藏、青海、四川、新疆和东北三省。其中的巫觋和萨满文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青年时期我大量收集史料，到了中年以后，就把重点偏向研究了，进行一定的理论升华。在进行多年调查的基础上，我进行了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最后写成学术专著，以

《巫与巫术》为书名在1983年发表，书中对巫的兴衰、信仰、职能，以及与历史、文学、歌舞、科技、天文、历法、医药、法律等的关系，最后是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大量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我意识到，巫觋，萨满是各民族的普遍信仰，没有一个例外。巫觋和萨满是原始民族的精神领袖，掌握知识比较丰富。他们是人神之间交往的媒介，又是原始科学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掌握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懂得巫术和原始知识。到了巫觋晚期，即祭司出现以后，他们在文明起源上也有重要作用。如关于文字的起源，人类最初是没有文字的，但是祭司起初以图画记事，进而发明了象形文字，无论是商代的甲骨文，还是纳西族、摩梭人的象形文字，都是巫觋的文字，一般民众并不使用文字。我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做过许多调查，当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最初是用图画绘制的，后来才发明了各种象形文字，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巫觋在文明起源上有过重要贡献。巫觋，特别是地位较高的祭司，应该是医者，是知识分子的前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西汉贾谊的话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因为古代占卜、行医都为祭司所掌握，正是在“卜医之中”孕育，产生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所以贾谊的话正反映了知识分子来源于巫觋的历史事实。所以，巫觋不仅有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史前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

《巫与巫术》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的肯定，读者反映良好，不过它是30年前的著作了。而今，我又进行一些补充、修改，增加了《巫与文字》一章，成为新的修订本，为了突出祭司的历史地位，现在书名改为《巫与祭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为什么要突出祭司的地位呢？肯定地说，在社会生活中，祭司是大巫，是宗教首领，又是继承、传播文化的智者；在政治上，祭司是部落首领或王者的助手，参与决策，起军师作用，或者的大巫就是由贵族成员担任的，或者集王与祭司于一身。但是在我国远古时代，王权高于神权，王为主，祭司为臣，祭司是王权的附庸。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与形成，除了依靠军事暴力之外，还要借助于宗教的帮助，这是古代社会的两大支柱，从巫觋分离出来的祭司，在文明

起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祭司积累了私人财产，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还对文明时代的早日来临起了催生作用，从这种角度说，祭司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这可以从祭司和战争、法律、礼制、文字的关系得到说明。

祭司是战争的吹鼓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战争是在边界偶然发生的，带有氏族自卫和血族复仇的性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征战都是国家的大事，在这些战争中，起着决策作用的是三种人：王、军事首领和祭司。祭司在战前是占卜师，从神权角度决定征战与否，也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军师、谋士；战争开始时，祭司要利用宗教形式，讲历史，述冤仇，鼓舞士气，煽动血族复仇；在征战中，与军事首领、王合作，研究对策；祭司还以巫术的形式，置敌方于死地；战后，祭司要主祭战神。

祭司是法律的执行者。过去氏族间的矛盾、冲突，是依靠习俗调解和战争解决的。后来由于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出现，社会矛盾空前增加，既有各氏族部落间的矛盾，也把冲突延伸到氏族内部，这时仅仅依靠氏族部落首领调解已经不够了，当时有兩種势力对处理社会冲突起重大的作用：一是王权、暴力；二是神的威慑力。因为神权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借助神权为自己服务，出现了神判，如占卜、诅咒、沸水捞石斧等，祭司就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

祭司促进了礼制的形成。在氏族时代，是以风俗维持社会秩序，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在原来宗教风俗的基础上又滋生一种礼制。《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概括地说，礼制是以名分、地位、礼仪、礼器、葬俗等形式，规定或限制社会各阶层的地位、行为规范，协调各阶层的冲突和关系，其核心是对贵族阶级整体利益的保障，保障以王权为轴心的社会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

祭司发明了文字。最早的巫觋是不脱产的，他们是氏族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宗教活动。尽管较一般氏族成员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还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在文化艺术上有较大作为。不过，一旦从巫觋分离出来，作为祭司，他们不仅有物力、财力进行宗教活动，还脱离了生产，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占卜、祭祀、巫

术，从中也发明了文字，有较多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如总结历法，从事歌舞、绘画艺术。《大戴礼·五帝德篇》中颛顼“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絮诚以祭祀”，把政治、宗教和历算结合起来，显然就是一位大祭司，是一位有文化的智者。

自巫觋产生以来，人类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过程。数百万年，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科学文化有了高度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巫教在地球上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各国还相当活跃。就中国来说，在一些农村和民族地区还有巫师在活动。巫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惰性和顽固性，并不会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更何况巫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历史之久，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巫教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与人类共始终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然最后也将走向消亡。

万事开头难。巫的研究，是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课题。历史的攻坚，过去多依仗于古代文献，但是有关史的记载相当缺乏。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维”方法，即利用古代文献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相结合，又将古史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一大步。我基本是按着上述方法研究历史的，但是民族调查使我认识到另一个史料来源，民族老资料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古“活化石”，因此我试图利用古代考古资料和民族老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探讨巫觋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当然，我的巫觋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回答，有些问题可作为专题探索，从这种意义上说，《巫与祭司》还是一部概论的著作。

做任何一门学问，或者做任何一项课题研究，都不能个人包打天下。我对巫的研究是历史性、阶段性的成果。做学问好像是一场无终点的接力赛，每个人只能跑好自己的棒，但要跑好，有特色，如此一棒一棒的跑下去，才能使所要探索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因此，我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抛砖引玉，后来者一定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把巫觋探索推向更高的水平。

（作者为国家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民族考古学家）

己。小剧场戏剧的主力军是民营剧团，应该给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自由创作，这也是我们在支持艺术。”话剧《7080》的编剧、重庆市303话剧社社长袁治提出自己的建议：“小剧场戏剧希望得到政府支持，目前小剧场戏剧演出的地域限制太强，很多很好的作品只能在北京、上海看到，如果政府能给我们一些资金或政策支持，剧团就有勇气把好戏送到全国去，大家应该关注一下边远地区，希望优秀的小剧场戏剧能让更多观众看到。”

注重原创 发扬自身优势和特长

研讨会上，针对目前国内小剧场戏剧创作力不够等问题，专家就如何进一步繁荣戏剧艺术创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有些戏题材很好、演员也很卖力，但看起来就是不太感人，我想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触还不深刻，此外小剧场戏剧创作在文学性上也应进一步提高。”刘平说。《剧本》杂志社原主编温大勇指出：“小剧场戏剧是从国外引进的，今后的发展需注重中国国情。不能把小剧场话剧只局限在很窄的范围内。现在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原创的东西太少，有思想深度、有思辨色彩、能反映对现实的批判的作品太少。小剧场戏剧应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廖向红也提出了几点建议：小剧场戏剧要有思想、要思考现实、为生活发言。另外还要考虑如何发扬小剧场戏剧的优势和特长。“小剧场天然属性是空间小、近距离，会带来篇幅、时间、演员人数、成本上的便利，同时也要求小剧场戏剧更精致、更细腻、有共享、有交流。演出空间要简约，不能有堆砌感，要追求完整和完美性，要让观众近距离看到精湛的演技，懂得欣赏演员的演技。”廖向红说。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原局长汪守德认为从艺术本身、国家艺术发展来看，小剧场戏剧还可以走得更好。“小剧场戏剧凝聚了很多人的才华，使更多文艺爱好者有了展示平台。小剧场并不意味着简单和简陋，实际上在那样有限的舞台和环境上，它对艺术的要求更高。小剧场戏剧能够起到让人正视社会矛盾和现实的作用，应保持自身自由、大胆、前卫、略带讽刺的一系列艺术特色。这也是区别于大剧场戏剧的重要方面。”他谈到。

民营影视公司应敬畏艺术、执著创新

曾庆瑞

2013年前7个月在国家电视剧主管部门备案公示准备生产的剧目中，无论是数量和规模，非主旋律的作品占有绝对优势。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也不是想象当中的元素尤和卖方和谐相处的市场。所以，这种现象说明，市场在电视剧领域正在排斥价值，我们的电视剧文艺事业正面临被市场所绑架的威胁。

如果我们扫描一下电视剧市场不难发现，市场排斥价值或者扭曲价值甚至可以颠覆价值，近几年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商业元素尤尤其是情色元素的浸染和渗透。这样一种现象跟我们整个的文艺风尚是分不开的，它是当下社会风气下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使然。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的电视剧主旋律作品的生产和发行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因为投资风险更大，因此更为艰难。民营影视公司该如何走出困境，我想说四点意见供参考。

第一，要“守身如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什么要用守身如玉这个词？因为市场的诱惑对民营公司有着极大的压力，它们中很多公司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编剧想通过揭示当前生活中的真实社会问题来触摸人间的冷暖、关怀人生，但是这样的片子往往在当前的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所以它们会感到非常迷茫。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特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当然，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编剧要用自己作品的艺术实践来表明至少是去践行了这样一个目标。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市场迷惑，不要失去已有的自我。

第二，要敬畏艺术，坚持以艺术为目标的创作道路。50多年来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电视剧乱象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被说得很乱，多数人认为是大众文化，其实就是商业艺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现在的电影观众中“90后”甚至“00后”的观众是主体，所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其实我更希望大家研究一下，这样一个观众群体是怎么样被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艺术口味、格调是我们培养的，除了学习、教育，还有电影电视剧作品在培养他们，塑造他们，不是上帝。

第三，要特立独行，坚持用特色产品塑造民营影视公司品牌。在北京有1465家民营影视公司，但大多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独特的品牌。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要至少在北京这1465家里面能够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才行。只有有特色和品牌才能够在众多的绿林好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执著创新，坚持通过创新确保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创新不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是生存和发展的必须”。所以，怎样不断地坚持创新来推进民营影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微 评 论
为叫停不规范学术项目叫好 缘起：据媒体报道，在最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验收工作中，5个研究项目被发现最终成果存在较多引文和注释不规范的问题而被终止。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学术规范性的审查力度，一旦发现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不规范等严重问题，将视情况作出终止或撤项处理。 文力谭点评：近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社科基金，叫停了5个不规范的学术项目，尽管这种叫停并非首例，但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其中缘由众所周知，就是近年来学术腐败问题日益凸显，从管理部门到学术界本身，对如何纠正这一歪风邪气，出台了不少的办法和措施，但是这一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各种学术腐败的事件，仍然不绝于耳，有的甚至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形象。沧海横流，倒是民间的学术打假人如方升宇先生、杨玉圣先生，力顶千钧，显出几分英雄气。但是从长远来说，纠正学术腐败还是要靠学术机制和制度的合理安排来进行。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拿出决心和勇气，叫停不规范项目，一方面可以警示项目承担人：申报时，量体裁衣，按需申报；获批后，认真投入，按时完成；研究中，严守规范，求实创新。但是要正本清源，规范知识生产流程，学术界本身的努力不可或缺。上世纪90年代，在邓正来等先生倡导下，学术界开展的“学术规范化”运动，在学术道德和操作规则上，曾为匡正一时之弊，发挥了良好作用，这一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 阅读是个性化的自我教育 缘起：据媒体报道，近5年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和图书阅读率都在徘徊中出现上升趋势，但仍有半数左右的国民一年中从不读书。有专家认为，扣除教科书，中国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都不到一本。而2012年美国读者平均一年阅读15本书，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 文力谭点评：笔者曾经看到一篇署名蒙莎莎的印度人撰写的谈阅读的文章，文章开篇写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机舱熄灯的睡眠时间，作者起身去厕所，经过许多座位，惊讶地发现，不睡觉玩ipad的竟然都是中国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在看电影和打游戏。作者的这种观察和以上的材料可以相互印证。由此，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子媒体千帆竞发地提供阅读内容的时代，我仍然深深地为国民的阅读生活的淡薄、简陋捏一把汗。笔者碰到一些人，甚至对“阅读”的必要性都存在怀疑。人为什么要阅读？人类文明是不断积累和叠加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人薪火相传的努力，人类社会是不会走到现代化的，只能停留在原始时代，茹毛饮血。对每一个个体而言，没有大量、细致的阅读生活，人很难去除掉自己身上来自生物本的诸多粗粝的部分，变得精致和文雅起来。尽管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教育在人的文明教化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人是从情感到思想到言行举止的复杂的存在物，要完成一个个体的文明化，需要思想和情感的诸多精细的修炼和打磨，这单靠有限的教育是难以完成的，阅读正是这样一种日常化的个性化的自我教育方式，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可或缺。